

“艺术是多姿多彩的，他也是一种。”

——关于余友涵老师的一些印象

河马

余友涵老师回归自然了。

余老师最初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正如他的名字所显示的：大度、包容、有涵养。初遇余老师，是1986年，和他的学生王子卫在书店偶遇他。余老师邀我们去离得不远的长乐路画室看看，当时他已经开始在画“黑白圆”。他谦虚地请我这个毛头小子提提意见，我就老实不客气地说了感受，提出了些不同意见，第二天还写了一篇批评他的评论寄给了他。过了几个月再去余老师家，见他把那几幅最早的“黑白圆”自制成一本画册，竟然还把写我的评论贴在第一页上，我暗暗吃惊，这是什么气量！后来问余老师，他说：毕竟你那篇评论是我最早收到的对“圆”的评论，蛮真诚的，再说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余老师的谦虚包容是发自内心的，他对他的学生们从不摆架子，总是在一起切磋。经常听见他问：最近在研究哪个画家？有什么心得？后来，我越来越觉得余老师的这种态度是真正能取得不断进步的智慧。有时，我和朋友在艺术观点上有分歧，余老师会告诫我：“艺术是多姿多彩的，他也是一种。”

边倒，那边就要拉一下”……太多了！这么些年，我就在这些“理论”引导、帮助下，成长，变老。

余老师另一个让人深深崇敬的品质，是慈悲善良。他温和谦卑，用流行的话说，很低调，但他的内心却是敏感而火热的。他不仅爱护他的家人、朋友，而且对芸芸众生都饱含着深深的悲悯之心。90年代后期他开始画“啊！我们”系列时，曾对我说过：“我画的都是我魂牵梦绕的东西。”他一直在画抽象画，但不追求不带感情的“纯形式”，而是通过色彩和笔触，让观者自己去体会那些形式的意味。

而对身边的朋友，余老师的慈悲更是无处不在。在我人生处于低谷时，他会骑两个小时自行车来看我鼓励我；每当工作、生活中遇上挫折，他会陪我散步谈心，给出他理性的分析和睿智的建议。有一次深夜他突然身体不适，打电话给他，他连忙赶来送我去医院做仔细检查，折腾到早上，后来得知，他一早还要赶到嘉定去上课……

至于余老师在艺术上的成就和对

现代艺术的贡献，早就自有公论，最近的“朋友圈”也多有介绍余友涵艺术的文章。我想多说一句的是：他的艺术语言并非仅仅只是对西方绘画语言的学习和借鉴，而是对所有人类艺术经验的学习和体会。余老师很早就和我说过：“我是古今中外的‘拿来主义’。”他的谦虚包容让他能不断地有新的探索，他的慈悲善良又让他具备更深刻的洞察力和表现力。他为探索美而画，也为表达自己的情感而画。我觉得他的艺术最核心的就是在表达“道法自然”，而不管古今还是中外，这是我们人类共同的大智慧。

前一阵，读到宋代禅师弘智正觉的一句偈语：“莫道鲲鹏无羽翼，今日亲从鸟道回。”这让我想起余老师的“圆”，特别是其中一张用蓝色画的右上角有块白色的大画（下图）。那张画是他的抽象画里首次出现了具象元素，其实是他早期的一张“黑白圆”，晚年他把那张旧作的笔触和背景色都改成了蓝色。当时他先用电脑打印了旧作照片作草图，草图右上方有块地方弄脏了，但却给他

带来新的启发，那天我去他画室，见他涂白了那一块正思考怎么改，我说现在这样看上去让人想到蓝天白云。余老师想了想，说：没再画下去，于是他的抽象画里就开始了地球上的蓝天白云。

当时余老师还点化了我一下：你有没有觉得这些自然行走的笔触像一只大鸟？我马上明白了，他是画他喜欢的庄子《逍遥游》的境界。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鹏其实是古人看到鲸鱼出水时想象它展开双翼化作大鹏。正觉禅师的偈语用“鲲鹏”一词，说明他很明白这个意象的源头：不要以为鲸鱼没有翅膀，你也会亲自经历鱼鸟变化般的天道变化和轮回。偈语体现了禅师对天道、自然、变化、无常、轮回的深刻体悟，而余老师的抽象画也有同样的意味。那张草图后来一直挂在我家墙上。

余老师病重时，有天我和汤光明老师去看他，从医院回到家，看着余老师的那张草图，我们都觉得正觉禅师的那句偈语送给余老师很贴切：

莫道鲲鹏无羽翼，
今日亲从鸟道回。



抽象 201404-07 (布面丙烯) 余友涵

笔会

今年是中国和西班牙建交50周年，年中的一天，在一个非常有中国书卷气的客厅，我与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的邓晓贤，还有来自西班牙的玛丽亚和米格尔夫妇一起共进晚餐。席间，邓晓贤希望趁着50周年大庆之际，玛丽亚夫妇能写一本书，反映中西友好交流的50年历史，以纪念两国建交的庆典日子。我当然赞成，而且我知道这一对西班牙夫妇既有这份热情，也有这份能力。我前两年获得国家社科重大课题，作为首席专家的我邀请两位西班牙朋友加盟并担任其中一个子课题的负责人，他们欣然应允，而且出手不凡。因此，不久经文化部的批准，我筹划创办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时，也正式邀请他们两位担任基地的特聘专家。

玛丽亚我认识她时，她是西班牙著作人和音乐家协会驻亚太地区总代表，当时我是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总裁，玛丽亚为我们穿针引线，介绍了许多好的剧目和展览。米格尔是玛丽亚的丈夫，本来就是一位儒雅的人，而且研究能力和写作能力都很强的社会学家。所以邓晓贤有此动议，我积极附和，并积极撮合他俩写这本书。他们夫妇在上海生活了二十年，以上海为

序跋精粹

半个世纪与半个千年

陈圣来

家，哪怕在上海疫情封控期间，他们仍然与上海不离不弃。因此他们来写这本书具有特殊意义。只是从动议到出书时间不到半年，实在太仓促，给他们的时间满打满算只有三个月，找资料还差不多，更何况还要写作。但是他们允诺了，并且马上取消了即将上路的旅行。三个月里，他们闷头找资料，酝酿构思，夜以继日地写作，并请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西语老师翻译，终于完成了这部书稿。

有一天，我收到了他们的西班牙语的书稿和中文翻译稿。光中文译稿就有130多页，不是仅仅关注中西建交的50年，而是两国交流的500年，时间跨度放大到十倍，书稿中许多资料和阐述弥足珍贵。我整整读了将近两天。我很兴奋，我原以为这本书不过是奉命之作，应景之作，能写出来，作为中西建交50周年的一种纪念，就很不错了。但没想到，这是一部具有相当学术价值的中西交往的专业著作，之前还没有在这一领域如此精耕细作的专著，作为学者，我如获至宝。

书从历史、文学、航海、贸易、政治、经济、外交、风俗、金融、艺术等几乎全方位地阐述了中西的交流历史和友好发展的渊源。其中不乏一些非常有价值的观点和有趣的发掘。例如，清朝全国流通的白银主要来自西班牙，以致后来变成西班牙白银几乎是唯一的中国流通领域的硬通货；弗朗门戈享誉世界，西班牙女郎在那激动人心的舞蹈节拍里，标志性的打扮是披肩，但那恰恰是风靡欧洲的中国大披肩。十九世纪西班牙最负盛名的作家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在他的小说

《福尔图娜和哈辛塔：两个已婚女人的故事》中说道：“西班牙妇女应当感激中国人，正是这美轮美奂、别具风情的大披巾，使她们光彩照人。”十九世纪的西班牙，女性会在重要场合身着中国裙子、肩披中国披肩，因为这会让她们旖旎瑰丽、华贵天下，收获众人艳羡的目光。

书中最为有趣的例子来自西班牙的文学巨匠塞万提斯，1615年《唐吉珂德》第二部出版，塞万提斯给他的保护人那不勒斯伯爵的献辞中讲：“现在居然有人冒称唐吉珂德第二，满世招摇，甚是可笑。”为了清除这个祸害，四面八方都催我写自己的唐吉珂德拿出来。最急切的莫过于中国大皇帝了。一个月以前，他用中文给我写了封信，亲自派人送来，要我，更确切地说是求我给他捐去一本《唐吉珂德》，因为他想建立一所卡斯蒂利亚语学校，打算拿《唐吉珂德的故事》当课本。”

书中还提到，中国在十六、十七世纪，国民经济总量是全世界第一，并受到欧洲国家的追捧……

总之，书中引经据典，资料翔实，出处明晰，不无惊艳之处。此书出版后我想一定会值得被放到我的书架上去的。

西班牙是航海时代海洋文明的国家，而中国既有海洋文明，也有内陆文明和草原文明，但总体来讲是一个陆地文明的国家，陆地文明主要包括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虽然我们有辽阔和漫长的海域，但文明是从黄河流域的中原起家的，长期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都在这一带。而且清朝政府一直奉行闭关自守的政策，多次颁布“迁海令”，封锁海域，因此使得海洋文明发展不起

来。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要早，而且我们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都远远超过他，但是我们只是想了解外部世界，并没有扩张的野心……因此，中国需要发掘和发展自身的海洋文明基因，需要接受海洋文明的催发和激荡，海洋文明是激情的，开放的，先进的，活跃的，冒险的，中国稳态而内敛的陆地文明应该与海洋文明的元素综合嫁接。

中国与西班牙的500年交往，是两种文明的对话，两种文化的交流。五个世纪的同频共振说明了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之间并不一定是剑拔弩张的冲突，而是可以对话可以交流可以互补可以同频共振的。就像提出“文明冲突论”的著名美国学者、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最后在他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中文版（新华出版社2020年5月42次再版）前言里承认的：“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

米格尔和玛丽亚的这本《西班牙与中国五个世纪的同频共振》将会在我们告别2023年之前面世，他俩将500年的中西交往史归结为两国的同频共振史，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智慧的说法。尽管500年来风风雨雨，有政权更迭，有意念冲突，有经济纠葛，有民风差异，但在互利互惠的原则下，在铸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 通衢上，两国走过了同频共振的五个世纪，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漫长的500年只是一个美好历史的开端。

里尔克一直是被诗人们津津乐道的人物，很长时间，我一直没有弄懂其间的思想之迹。后来偶读冯至谈里尔克的文字，稍有体味，而深者却依然模糊。直到最近看到解志熙近出的素体诗集《浮世草》，里面附录了他与诗人西渡讨论诗学的文字，谈话中涉及里尔克与冯至的地方很多，一些疑团豁然解开。在解志熙看来，最好的诗人是有一种关怀感的，“诗归根到底乃是我们人类作为‘关怀的存在’所以不能不有所关心或关怀的产物”。解志熙说自己的这种“关怀的诗学”受到冯至的影响，因为这位诗人“既有对孤独个体之存在因局的深入揭示，又显示出相互关爱、相互分担的庄重关怀”。解志熙发现，冯至的好，可能受到了里尔克和雅斯贝尔斯的启发，因为这两人身上没有尼采与海德格尔式的偏执。

我喜欢的诗人有些是偏执的，所以对于解志熙的看法略有一点不同，那些迅猛的诗人所以诱人，大约也是有所关怀的，只是走得过于猛烈了。尼采在《苏鲁支语录》里的话，也是大有情怀的，只是走得过远，我们难以跟上。波德莱尔的诗歌，有幽暗之感，词语会把人拽向神异之地。这些都让读者恍然意识到存在的尴尬，也未必不好。不过，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诗歌，确也有过于空幻之处，不能有温润的宽度，解志熙的警惕，也不无道理。

解志熙是研究过冯至的，对于诗人的审美深处的光泽自有会心领悟之处。他觉得冯至《十四行集》是好的作品，没有一般诗人滥情的东西。在解志熙眼里，冯至是正常的诗人，喜欢“思量”而非激烈之想。正常，就要舍弃些什么，《十四行集》在起伏的情感体验里，也因了自我的克制丢掉了什么。我的印象里，他是善于从不同思想者和诗人的智慧借取力量的人，歌德、里尔克、杜甫、鲁迅都是他心仪的人。其中歌德对于他的影响不可小视。歌德有激情万丈的时候，但也有沉静、冷思的状态，冯至称他“一生不是直线的，而是旋转的”，有一个“更高的力的意志”。在孤独、苦楚之外，还有着望道的充实。所以诗人在片面的深刻之余，当注意精神的平衡。这大概也影响了冯至的诗，注意对于自我感情的理性化的表达，除了心灵感应的涂抹，还不乏学识的渗透。这就远离了波德莱尔式的主我，和反雅化的审美，辞章不是阴郁的，而是中正地立在那里。他摄取了鲁迅的忧愤，杜甫的情怀，而包容性方面则来自歌德和里尔克。他在《里尔克——为十周年祭日作》引用了《布里格随笔》的片段，表示诗人的使命不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而不能拔身，而是关注世间广大的人们，无边的海洋和异乡的路途，不同人等该是凝视的对象。这很像托尔斯泰的忧患和雨果的慈悲，冯至感到，能够脱离小我的世界而融入更为广阔的空间，其实是极为重要的。

冯至许多作品都有质感，我自己印象深的是小说《伍子胥》。这是一篇与众不同的作品，既无什么情节，也没有更多的人物，叙述的逻辑也是简单的。不过作者却以诗一般的画面，流出生命体验中的那些悲怆、慷慨之意。置身于战争年代，对于远古的血腥之气、复仇之士的理解，突然立体化了。小说没有写伍子胥复仇的场景，而是其离开楚国，在外流浪的所遇所感。对于家国、人性、信仰与承担的体味，纠缠着许多光影。在这里，儒生的内敛之态消失了，而是多了天地之间初始的元气，生命未曾被帝王意识污染的灵动，植根于大地的生命意识的纯美之态，向四处蔓延着。伍子胥一路走来，遇到了许多陌生的人，那里也不乏山林间的素朴者、高贤者。楚狂、渔夫、洗衣女，都让主人翁心灵一动，在他们身上读出人间的本色。于战乱频仍的年月，保持一种纯净的心，多么难得。复仇者也从一种，忽地明白自己的精神要填补的东西是什么，要走的路该在什么地方。

《伍子胥》要表达的，已经超出了复仇性的话题，说它带着诗人的哲思也并非不对。现代德国哲学的追问感和悱恻感，不经意间造成阅读的张力。不是布道，而是体悟，靠着对于存在的感知，去呈现心灵深处的波动。冯至说，这作品受到了里尔克《旗手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的影响，“在我那时是一个意外的、奇异的收获。彩色的绚烂，音调的和谐，从头至尾被一种忧郁而神秘的情调支配着，像一阵深山中的骤雨，又像一片秋野里的铁马风声”。他坦言，真正写此作品时，“掺入许多琐事，反映出一些现代人的、尤其是近年来中国人的痛苦。这样，二千年前的一段逃亡故事变成一个含有现代色彩的‘奥德赛’了”。

从里尔克到冯至，看出审美的一条线索的波动。诗人们对此可能更为敏感。西渡在与解志熙的对话里，是从创

孙郁

「偏」能否通于「正」

作论层面而非知识层面考虑问题，比如他把诗人分为植物性的深植者和动物性的漫游者两大类，前者与里尔克不同，是深扎在大地的，在微笑之处体验深广的世界的神奇之影，陶渊明与狄金森、冯至属于此类。这种划分，也是颇为启示人们对于艺术存在多样性的理解，有一个“更高的力的意志”。在孤独、苦楚之外，还有着望道的充实。所以诗人在片面的深刻之余，当注意精神的平衡。这大概也影响了冯至的诗，注意对于自我感情的理性化的表达，除了心灵感应的涂抹，还不乏学识的渗透。这就远离了波德莱尔式的主我，和反雅化的审美，辞章不是阴郁的，而是中正地立在那里。他摄取了鲁迅的忧愤，杜甫的情怀，而包容性方面则来自歌德和里尔克。他在《里尔克——为十周年祭日作》引用了《布里格随笔》的片段，表示诗人的使命不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而不能拔身，而是关注世间广大的人们，无边的海洋和异乡的路途，不同人等该是凝视的对象。这很像托尔斯泰的忧患和雨果的慈悲，冯至感到，能够脱离小我的世界而融入更为广阔的空间，其实是极为重要的。

冯至许多作品都有质感，我自己印象深的是小说《伍子胥》。这是一篇与众不同的作品，既无什么情节，也没有更多的人物，叙述的逻辑也是简单的。不过作者却以诗一般的画面，流出生命体验中的那些悲怆、慷慨之意。置身于战争年代，对于远古的血腥之气、复仇之士的理解，突然立体化了。小说没有写伍子胥复仇的场景，而是其离开楚国，在外流浪的所遇所感。对于家国、人性、信仰与承担的体味，纠缠着许多光影。在这里，儒生的内敛之态消失了，而是多了天地之间初始的元气，生命未曾被帝王意识污染的灵动，植根于大地的生命意识的纯美之态，向四处蔓延着。伍子胥一路走来，遇到了许多陌生的人，那里也不乏山林间的素朴者、高贤者。楚狂、渔夫、洗衣女，都让主人翁心灵一动，在他们身上读出人间的本色。于战乱频仍的年月，保持一种纯净的心，多么难得。复仇者也从一种，忽地明白自己的精神要填补的东西是什么，要走的路该在什么地方。

《伍子胥》要表达的，已经超出了复仇性的话题，说它带着诗人的哲思也并非不对。现代德国哲学的追问感和悱恻感，不经意间造成阅读的张力。不是布道，而是体悟，靠着对于存在的感知，去呈现心灵深处的波动。冯至说，这作品受到了里尔克《旗手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的影响，“在我那时是一个意外的、奇异的收获。彩色的绚烂，音调的和谐，从头至尾被一种忧郁而神秘的情调支配着，像一阵深山中的骤雨，又像一片秋野里的铁马风声”。他坦言，真正写此作品时，“掺入许多琐事，反映出一些现代人的、尤其是近年来中国人的痛苦。这样，二千年前的一段逃亡故事变成一个含有现代色彩的‘奥德赛’了”。

从里尔克到冯至，看出审美的一条线索的波动。诗人们对此可能更为敏感。西渡在与解志熙的对话里，是从创

的确，孔孟等先贤都非常关怀个人之仁勇和人间之仁道。我之所以称里尔克的关怀诗学是凛然仁者之言，即有鉴于他暗合了仁美交融的中国古典人文主义诗学传统也。

我个人觉得，解志熙是从文德的高度思考诗学问题，而非是西渡那样以个人的角度看待创作。前者求精，避免片面，而诗人不免走在奇险之径。问题在于是否拥有生命的体验所展现的精神之光，回想一下，思想解放也有赖于非规范蹈矩之士，波德莱尔与兰波也不是没有开启的意义。于是偏执能否趋于雅正就成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追问对于我来说，深化了对于里尔克的认知，也意识到冯至何以没有走上鲁迅那样的路。作为一个学人，冯至提供的参照甚多，健康明朗的一面似乎也传染给了解志熙，解氏的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儒雅、高古之气，便是证明。“关怀的诗学”考虑的是兼顾多元思想，偏执的写作有时一意孤行。如何面对这些不同遗产呢？解志熙与西渡反复讨论，彼此修正，最后的结论是二者不能互为代替，可谓客观之论。联想起钱锺书对比李贺与波德莱尔时说的话，“独立与偶合遂同时并作，相反相成”，也是对于“偏”能否通于“正”的体味。这个话题尚需不断地打开，说它是文学史纠结性的题目，也未尝不对。而像解志熙与西渡“和而不同”的对话，在今天就显得殊为难得。

2023.11.27



本文系即将出版的《西班牙与中国五个世纪的同频共振》序



「文汇报」
微信公众号